

中共 19 屆 6 中全會—— 第三次歷史決議評析

The Sixth Plenary Session of the 19th CPC Central Committee
—An Analysis of the Third Historical Resolution

郭瑞華 (Kuo, Jui-Hua)

本刊特約研究員

壹、前言

中共第 19 屆中央委員會第 6 次全體會議（下稱：19 屆 6 中全會）於今（2021）年 11 月 8 日至 11 日在北京舉行，中央總書記習近平代表中央政治局向全會作工作報告，並審議通過《中共中央關於黨的百年奮鬥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下稱：《決議》），決定中國共產黨第 20 次全國代表大會（下稱：20 大）於明（2022）年下半年在北京召開。全會結束，官方即發布《中國共產黨第 19 屆中央委員會第 6 次全體會議公報》，11 月 16 日再發布《決議》全文及《習近平關於〈決議〉的說明》。事實上，此次會議最重要的議程就是審議《決議》討論稿，因此，本文聚焦分析中共提出《決議》的背景、內容、意涵以及影響。

貳、背景

《決議》提出的背景，正逢中共一方面喜迎建黨百年，一方面追逐「中國夢」卻面對外部渲染「中國威脅」的嚴峻挑戰，也是新冠肺炎

(COVID-19) 疫情難以遏止之際。大國競爭，美「中」衝突從貿易戰延伸至科技戰。美國從高科技產業的上中下游的制裁，讓中共高喊「內循環」與「自力更生」的同時，卻也面臨經濟衰退的事實。對內，疫情影響經濟增長，失業率增加，貧困問題似解未解，香港、新疆等地人權問題成為社會維穩的隱患。對外，國際指責中共隱匿疫情並求償，美「中」在南海軍事對峙越演越烈，共軍持續在臺海周邊侵擾，也讓臺海成為區域衝突的焦點；一時之間，國際社會對中國大陸（下稱：大陸）的觀感持續惡化。「中國崛起」所帶來政治、軍事、經濟、文化威脅等聲浪達到高點，取代「中國和平發展」的論調。

就中共歷史進程來看，其必須透過新一版的《決議》，說明、解釋並證明中共做為唯一永恆的執政黨，其以黨治國從過去、現在到未來的合法性與合理性。意識形態層面，《決議》必須處理習近平與歷任領導人的關係，捨棄不當的割裂以及合理的傳承，以便有助於習近平歷史地位的建立。政策面上，《決議》自然梳理習近平上臺以來的各項施政作為。如此，透過意識形態與政策的結合，進一步以習近平為核心的統治，型塑現階段以及未來面對國內外問題的權力穩定與權威正當，形成「發展—改革—穩定」三位一體。

參、內容

此前中共黨史上，亦曾發布過兩次歷史決議，分別是 1945 年「6 屆 7 中全會」通過的《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1981 年「11 屆 6 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本次決議為第三次。可知，過去兩次決議係在處理重大歷史是非問題，從否定左傾錯誤出發，以為後來的執政奠基。今次決議則未批判特定政治路線，而以全面肯定中共歷任領導人功績的方式，鋪陳習近平在黨史中「承先啟後」的角色。雖然時空不同，但三次歷史決議，都是在發生中共黨內的歷史轉折跟重要關鍵時期，目的都在定於一尊，提供未來新的指引方向。

《決議》全文三萬六千餘字，其中習近平執政迄今的 9 年列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共一萬九千餘字；毛鄧江胡等四人執政的 91 年，呈現

的字數不到習近平執政 9 年的一半。以習近平上臺的 2012 年中共 18 大為「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之界限，此前的 91 年，分為「奪取新民主主義革命偉大勝利」、「完成社會主義革命和推進社會主義建設」、「進行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篇幅合計約九千七百字。透過內容遠略近詳的鋪陳，凸顯習近平的歷史地位。

在中共 18 大之前的陳述中，前兩個時期敘述毛澤東的功與過，維持鄧小平時期以來對毛澤東的評價：功大於過。《決議》提到「大躍進」、「人民公社」的錯誤，並指毛澤東「發動和領導了『文化大革命』，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利用毛澤東同志的錯誤，進行了大量禍國殃民的罪惡活動，釀成十年內亂」。1976 年 10 月「四人幫」被粉碎，結束文革這場「災難」。

第三個時期敘述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三人的領導事蹟，一樣多所讚頌，提及鄧小平「創造性提出『一國兩制』構想，開闢了以和平方式實現祖國統一的新途徑」；成功開創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形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實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新的飛躍。

習近平新時代，計有：堅持黨的全面領導、全面從嚴治黨、經濟建設、全面深化改革開放、政治建設、全面依法治國、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生態文明建設、國防和軍隊建設、維護國家安全、堅持「一國兩制」和推進「祖國統一」、外交工作等十三個方面論述，全面梳理並肯定習近平上任以來的政績。

《決議》觸及臺灣、香港問題，但香港篇幅遠多於臺灣。面對香港問題，中共強調在香港治理上的「政績」，表示在堅持「一國兩制」和推進「祖國統一」上，採取一系列標本兼治的舉措，堅定落實「愛國者治港」、「愛國者治澳」，推動香港局勢實現「由亂到治」的重大轉折，為推進依法治港治澳、促進「一國兩制」打下堅實基礎。另一方面，面對臺灣問題，「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和『九二共識』，堅決反對『臺獨』分裂行徑，堅決反對外部勢力干涉，牢牢把握兩岸關係主導權和主動權。」

《決議》後文陳述中共建黨百年的歷史意義及歷史經驗。歷史意義，強調中共對於中國人民、中華民族、馬克思主義、世界歷史等的貢獻；歷史經驗，則歸結「十個堅持」：黨的領導、人民至上、理論創新、獨立自主、「中

國」道路、胸懷天下、開拓創新、敢於鬥爭、統一戰線、自我革命等。最後號召，要緊密地團結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全面貫徹「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實現「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而不懈奮鬥」。

肆、意涵

《決議》其實凸顯意識形態、政策與權力三者之間的「發展—改革—穩定」。意識形態上，辯證地強調馬克思主義與「中國」本土的具體結合，繼承立黨基本的社會主義理論以及前人的遺產：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等。不過，與「中國」本土的結合，則是意味著繼承中有所開放，這也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著墨之處，為現在的政策路線，以及未來的政策調整，紮下合法性的基礎。

從穩定的角度來看，《決議》將文革定調為「十年內亂」及「災難」，維持鄧小平時期「撥亂反正」以及對毛澤東的評價「功大於過」，但也特別提到四人幫運用毛澤東「錯誤的估計」這一段文字；另一方面，《決議》也將 1989 年「六四」事件定調為「嚴重政治風波」及「動亂」，文字使用一如中共一貫作法，但也特別提到國際上反共反社會主義的敵對勢力的支持和煽動這一段。顯然，在歷史文本的處理上，中共必須小心翼翼地面對毛澤東與鄧小平所發生的事件，過分調整以及毫無保留地繼承，均不可行。畢竟兩位最高領導人的存在代表著中共歷史以及當前的大陸。誠如習近平對《決議》的說明：要堅持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論，用具體歷史的、客觀全面的、聯繫發展的觀點來看待黨的歷史。此亦代表習近平現在與未來政策路線調整的「師出有名」。

簡言之，習近平在強調「不忘初心」，重提毛澤東事蹟以及打破鄧小平奠定的任期制、集體領導等制度主義作為的同時，必須強調「反左傾」，持續深化改革開放；另一方面，中共建成小康社會、邁向第二個百年的同時，更從政策與道德面，強調從嚴治黨、依法治國等諸種堅持，亦是「反右傾」。

當然整份決議的比重上，在在凸顯習近平的執政成就與地位，全文中習近平出現 23 次、毛澤東 18 次、鄧小平 6 次、江與胡各 1 次。《決議》刻意凸出習近平定於一尊的現實，坐實近年來習近平超越鄧小平、比肩甚至超越毛澤東的說法，自然為他個人 2022 年在 20 大延任以及政策路線鋪路。畢竟，習近平已是「新時代」第一人，其他領導人都是屬於舊時代，其權力的合法性與合理性深入民間，透過教育體制深入民間進行「造神」。

伍、影響

在對內方面。如今，習近平的權位推得越高，反而對未來的權力交接埋下更多風險。後習近平時代，中共必須解決是否引發權力鬥爭的政治繼承問題，以及後繼接班人能否穩當妥善處理政治強人遺緒問題？尤其是習近平如果只續留一任，下任繼承人將如何在強人陰影下領導中共開展政局，是繼續堅持「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還是開創新的一套理論體系？

此外，中共已完成習近平念茲在茲的「脫貧攻堅」任務，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第一個百年奮鬥目標；當前，「共同富裕」將是中共在第二個百年追求的目標，因此，明年中共召開 20 大的主軸似乎就是「共同富裕」。社會主義強調平等，中共要降低貧富差距，推動「共同富裕」，就要建構效率、公平兼具的收入分配體系，一方面促進私營企業發展，一方面讓最富有階層透過第三次分配把錢繳出來或捐出來，將來大陸那些鉅富們如何應對，值得觀察。

一般以為習近平在中共 20 大連任不會遇到什麼反對力量，惟為了確保沒有雜音和變數，最近幾個月，中共打虎的速度明顯加快；公安部副部長傅政華的落馬，可能是新一輪對高官清洗的開始。換言之，20 大前，習近平仍然要持續打著反腐旗號，以不斷的政治清洗，來展現他的絕對權力。此外，近期對國有金融機構採取深廣的巡視審查，反映中共當局先發制人介入市場過度投機的行為，同時預期其在未來仍會陸續推出監管政策，避免市場變成問題。然而，該項行動恐將減弱未來的經濟增長，這對中共而言將陷入

兩難，思考如何在既整頓金融，又要避免影響經濟發展之間，取得平衡。

在對外方面。由於習近平將長期領導大陸，世界各大國尤其是美國，都必須與習打交道。做為一個民族主義強人，習近平希望平視世界，可以跟美國平起平坐。他確實以強勢的領導、霸氣的決斷，展現維護中共統治的自覺與自信，然而他真有爭霸世界的野心？還只是西方媒體對他的過度想像，值得進一步探究。

蘇聯解體、冷戰結束後，學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曾提出「歷史終結論」，指稱依照歷史發展方向，自由民主制度將會成為人類最終的社會形態，其他社會形式將不能持續存在。但在看到中共的執政和應變能力，他認為大陸構成了對「歷史的終結」這個觀念的最重要的挑戰，如果大陸繼續保持強大和穩定的狀態，確實可能成為自由民主制以外一個真正的替代性選擇。近年，大陸的成功發展，讓中共充滿自信，強調其將大陸變成全球第二大經濟體，重新賦予馬克思主義一種生命力，馬克思主義並沒有消亡，同時，大陸有別於西方資本主義，走出一條屬於「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證明其制度優越性。在《決議》中就有 9 次提到「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表明「黨領導人民成功走出中國式現代化道路，創造了人類文明新形態，拓展了發展中國家走向現代化的途徑，給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發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獨立性的國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選擇。」面對中共越來越強大，而且充滿自信，其建構的「中國治理模式」是否成為世界一些威權國家借鑑對象，亦值得觀察。

在對臺方面。此次《決議》在面對臺灣問題上，強調解決臺灣問題、實現統一乃中共的「歷史任務」，然而涉臺的篇幅上不僅比港澳少，所提到的處理方式也只是重述近年來習近平的對臺政策作為。一方面，儘管國際社會譴責聲音不斷，但中共已經控制住港澳，《決議》根本只是闡述政績；另一方面，臺灣問題畢竟與港澳問題不同。所謂的反對外部勢力干涉、牢牢把握兩岸關係主導權和主動權等用語，正顯示中共實無法掌控主導臺灣問題，中共尚須與美國進行博弈等。

中共為顯露現階段對臺政策以反獨為重點，以及把握兩岸主動權和主導權，近期操作打擊所謂臺獨金主，以政治傾向不明顯的遠東集團為目標，意

在臺商企業間引發寒蟬效應，顯示中共不再顧及臺灣民眾觀感，以及是否因而引發臺商出走潮。中共不斷地操作「二元對立」的「敵我分明」，讓兩岸關係似乎越來越走向對抗的局面。

然而，就兩岸關係發展看，中共或許該思考的是，何以對臺政策宣傳用盡民族主義等相關歷史、文化、情感華麗辭藻，對臺灣人民還是誘因不大？除此，兩岸交流經驗亦顯示，中共對臺的行為越強制，反倒越助長臺灣內部的「反中」情緒。

陸、結語

中共透過《決議》，進行「兩個確立」：確立習近平核心地位和確立「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理論指導地位，讓習近平的歷史地位與理論正式確立。以毛、鄧而言，都是費時數十年，經歷多次政治鬥爭，才達到歷史高位，如今，習近平上任僅 9 年就達到與毛、鄧並駕齊驅的地位。顯見至此，習近平的權力已到達巔峰，沒有人可以撼動。然而，大陸改革開放後，軟實力增長快速，但也引來國際社會針對中共銳實力「中國威脅」質疑與恐懼的聲浪不斷。如今，隨著美「中」對抗的擴大，甚至可能演變成西方國家對大陸全方位的圍堵或「新冷戰」，中共領導人雖樂觀倡言「自力更生」，以及「暢通國內大循環、促進國內國際雙循環」，然而，亦顯示中共正承受因國力發展遲滯甚至倒退，所帶來的內外壓力。以習近平當前擁有的權勢，在大陸內部不可能出現挑戰者，但外部的挑戰卻接踵而來，讓其必須不斷地強調「政治安全」，顯示習近平其實是個沒有安全感的強人，想要絕對的安全，建立不可挑戰的權力與權威。